

中国知网（CNKI）来源集刊

复旦大学“学术期刊质量提升支持计划”资助立项

Journal of China's
Neighboring Diplomacy
Volume 5, Issue 1 (2019)

中国周边外交研究

第九辑

复旦大学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研究中心 编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周边外交研究. 第9辑 / 复旦大学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研究中心编. —北京: 世界知识出版社, 2019.12

ISBN 978-7-5012-6148-2

I. ①中… II. ①复… III. ①中外关系—研究

IV. ①D82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20) 第201609号

责任编辑
责任出版
责任校对

狄安略
赵 玥
张 琨

书 名
主 编

中国周边外交研究·第九辑
Journal of China's Neighboring Diplomacy: Volume 5, Issue 1 (2019)
复旦大学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研究中心

出版发行
地址邮编
网 址
电 话
经 销
印 刷
开本印张
字 数
版次印次
标准书号
定 价

世界知识出版社
北京市东城区干面胡同51号 (100010)
www.ishizhi.cn
010-65265923 (发行) 010-85119023 (邮购)
新华书店
北京虎彩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710毫米 × 1000毫米 1/16 19%印张
344千字
2020年10月第一版 2020年10月第一次印刷
ISBN 978-7-5012-6148-2
98.0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为适应我国信息化建设，扩大本集刊及作者知识信息交流渠道，本集刊已被中国知网（CNKI）系列数据库收录，其作者文章著作使用费与本集刊稿酬一次性给付。免费提供作者文章著作引用统计分析资料。如作者不同意文章被收录，请在来稿时向本集刊声明，本集刊将做适当处理。

《中国周边外交研究》半年刊

主 管 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

主 办 复旦大学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研究中心

主 编 石源华

副主编 包霞琴 祁怀高

编 委 (以姓氏笔画为序)

左希迎 中国人民大学

石源华 复旦大学

卢光盛 云南大学

归咏涛 北京大学

包霞琴 复旦大学

关培凤 武汉大学

祁怀高 复旦大学

李皖南 暨南大学

杨 健 复旦大学

吴心伯 复旦大学

[日本] 青山瑠妙 日本早稻田大学 (Waseda University)

赵卫华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赵可金 清华大学

钟飞腾 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

费 晟 中山大学

薛 松 复旦大学

魏 玲 外交学院

[马来西亚] Datuk Danny Wong Tze Ken

马来亚大学 (University of Malaya)

编辑部 胡旻昱 张泽宇

编辑部联系方式

投稿邮箱: ccmc@fudan.edu.cn

电 话: 86 21-6564 2939

传 真: 86 21-6564 2939

地 址: 上海市邯郸路220号复旦大学文科楼307室复旦大学中国与
周边国家关系研究中心

邮 编: 200433

目录

CONTENTS

卷首语..... 石源华 / 1

中国周边外交七十年专栏

周边外交视阈下的中国 70 年对美外交..... 潘亚玲 / 11
中国对日外交 70 年述论..... 吴寄南 / 31
中国对印外交的历史、现状和未来..... 关培凤 / 52
中国对中亚区域外交的历史演进和未来发展..... 张 宁 / 74
中国西亚区域外交：历程、成就与未来抉择..... 郭 锐 / 94
中国对南太平洋区域外交 70 年述论..... 费 晟 / 113

中国周边外交综论

关于中国周边问题的思考..... 张蕴岭 / 137
改革开放 40 年中国周边外交的理念与实践..... 李 文 刘铭贻 / 142
构建新型国际关系与中国周边学..... 夏立平 钟 琦 / 159

中国周边学笔谈（三）：青年专场

反思与建构：中国周边学中层理论探索..... 蒋建忠 / 177
浅议中国周边学的价值取向..... 薛 松 / 182
中国周边学与东西方外交理论的比较与融合..... 曹 玮 / 187
“中国周边学”的三种解读和创设目标..... 张 群 / 192

中国周边学的新课题：如何为区域提供规范.....	贺嘉洁 / 197
学习者视阈下的中国周边学“十问”.....	张 励 / 201

中国周边专题研究

中国周边经济形势的评估和分析.....	钟飞腾 / 211
“一带一路”与中国国家形象的内外构塑.....	马丽蓉 / 238
论新时代海防观的理论来源、内涵及思维方法.....	高新生 / 248

新书栏

中国周边学的提出、推介和研究 ——《中国周边学研究文集》前言.....	石源华 / 269
--	-----------

会议综述

第八届中国周边外交研讨会综述.....	胡旻昱 / 283
---------------------	-----------

附 录

复旦大学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研究中心简介.....	/ 295
《中国周边外交研究》征稿启事.....	/ 297
《中国周边外交研究》稿件体例及注释规范.....	/ 299

Contents

Preface.....*Shi Yuanhua* / 1

China’s Neighboring Diplomacy in the Past 70 Years

China’s Diplomacy toward the U.S. in the Past 70 Years: A Review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hina’s Diplomacy with Its Neighboring Countries	<i>Pan Yaling</i> / 11
A Review of 70 Years of China’s Diplomacy toward Japan	<i>Wu Jinan</i> / 31
The History, Reality, and Future of China’s Diplomacy toward India	<i>Guan Peifeng</i> / 52
The Historical Evolution and Future Development of China’s Diplomacy with the Region of Central Asia	<i>Zhang Ning</i> / 74
China’s Diplomacy with the Region of West Asia: Process, Achievements, and Options for Future.....	<i>Guo Rui</i> / 94
A Review on China’s Diplomacy with the Region of South Pacific in the Past 70 Years.....	<i>Fei Sheng</i> / 113

Comprehensive Studies on China’s Neighboring Diplomacy

On Solving China’s Neighboring Issues	<i>Zhang Yunling</i> / 137
Conception and Practice of China’s Neighboring Diplomacy in the Past 40 Years of Reform and Opening-up	<i>Li Wen and Liu Mingze</i> / 142
Constructing a New Type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China’s Neighboring Countries Studies	<i>Xia Liping and Zhong Qi</i> / 159

China's Neighboring Countries Studies Report, Part 3: Young Academics

Reflection and Construction: Exploring Middle-range Theory in China's Neighboring Countries Studies	<i>Jiang Jianzhong</i> / 177
Discussion on the Value Orientation of China's Neighboring Countries Studies	<i>Xue Song</i> / 182
Comparison and Integration of China's Neighboring Countries Studies and Diplomatic Theories of East and West	<i>Cao Wei</i> / 187
Three Interpretations on China's Neighboring Countries Studies and Its Targets	<i>Zhang Qun</i> / 192
New Subject of China's Neighboring Countries Studies: How to Provide Paradigm for the Region?	<i>He Jiajie</i> / 197
10 Questions about China's Neighboring Countries Studi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a Learner	<i>Zhang Li</i> / 201

Research Topics on China's Neighboring Diplomacy

Assessment and Analysis on the Economic Situation in China's Neighboring Countries	<i>Zhong Feiteng</i> / 211
BRI and the Internal and External Construction of China's Image	<i>Ma Lirong</i> / 238
On the Origin of Theory, Contents and Thinking Methods of Coastal Defense in the New Era.....	<i>Gao Xinsheng</i> / 248

Reading Recommendation

Preface of Essays on China's Neighboring Countries Studies: Proposing, Presenting and Studying China's Neighboring Countries Studies	<i>Shi Yuanhua</i> / 269
--	--------------------------

Reviews on Symposiums

A Review on the 8th Symposium of “China’s Neighboring Diplomacy”	<i>Hu Yangyu</i> / 283
---	------------------------

Appendix

Introduction on Center for China’s Relations with Neighboring Countries of Fudan University (CCRNC-Fudan).....	/ 295
Notice Inviting Contributions to the Journal of China’s Neighboring Diplomacy	/ 297
Standards of Articles and Annotations of the Journal of China’s Neighboring Diplomacy	/ 299

周边外交视阈下的中国70年对美外交

潘亚玲

【内容提要】由于不同的历史发展进程，中美两大文明的历史和现实互动更多地发生在中国周边地区。从周边外交视角看，中美关系大致经历了战略敌对下的体系性对抗、战略对接下的放任自由和战略竞合下的短兵相接三个阶段发展。在这一过程中，中国对美外交实现了持续创新，对周边地区产生了深远影响：战略理念逐渐升级为着眼于整个人类可持续发展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战略内涵正朝向政治—经济—人文三大支柱齐头并进的方向发展，战略手段重点转向塑造国际公共产品供应比较优势结构。尽管如此，美国对华战略冒险主义和周边国家战略机会主义的上升，意味着中国实现可持续崛起的更高战略要求，其核心是确保周边地区成为中美间的桥梁而非麻烦，特别是使周边地区成为中美公共产品供应比较优势结构的确认者，中美价值链重构的中间人，中美全球治理合作的示范区及中美文明互鉴的试验田。

【关键词】周边外交 中美关系 中国崛起 人类命运共同体

【作者简介】潘亚玲，云南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研究员，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

尽管伊恩·莫里斯（Ian Morris）认为，以中国为代表的东方文明从来就没有领先过自古罗马以来直至今日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文明，但更大的共识是

东方文明的确曾引领世界长达几千年。^① 由此而来，新中国成立以来的中国对美外交，事实上意味着两大文明的历史性互动，翻开了新的篇章。尽管如此，对中美关系的认知更多为两个视角主导：一是从中短期视角出发，关注相对具体的战略和利益计算；二是从周边互动视角出发，关注中美更为密切的互动。从后一视角看，新中国成立70年来的对美外交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的发展，即冷战前半期主要基于战略对抗的系统性互动，冷战后半期及之后较长时间内双方更多追求战略对接而给予周边地区较大自由空间，以及当前中美进入系统性竞争与合作后更多关注双方在周边的“短兵相接”。在这一历史性演变过程中，中国对美外交，特别是从周边环境塑造的视角看，有着持续且重大的创新或升级，覆盖战略理念、战略内涵和战略手段三个方面。鉴于文明互动的宏大规模与缓慢进程，美国对体系性权势转移的战略焦虑心理正促使中美关系的竞争面被不实放大，并刺激了周边中间国家的战略机会主义上扬，不仅为双边关系带来困难，也为中美各自克服内部困难，推动自身发展增添了变数。

一、周边外交视野下的中美关系历史演进

中美接触始于1784年“中国皇后号”的访问，但直到20世纪70年代前，双方接触并不多。尽管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曾试图同时接触国共双方，但1949年新中国的成立，特别是中国采取“一边倒”战略后，美国关闭了中美接触的大门。这一源于中短期两极对抗的战略计算，使中美成为“想象的敌人”，并在周边展开了基于国际均势的体系性对抗；但同样是在两极体系框架内，中美却在不到30年的时间里从“想象的敌人”转变为“想象的朋友”，这对周边的中间国家而言，是难得的战略机遇。两极体系的终结，推动中美寻求双边关系的新方向，而体系性权势转移进程的推进甚至加速，正促使竞争在双边竞合关系中得以凸显。尽管略有差异，但中美在周边地区的互动与双边关系的整体演变上，总体保持一致，其根本原因源于周边地区对中美而言近乎同等的战略重要性。

^① [美]伊恩·莫里斯：《文明的度量：社会发展如何决定国家命运》，李阳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4年。《文明的度量》一书事实上是莫里斯另一著作《西方将主宰多久：从历史的发展模式看世界的未来》（钱峰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1年）一书的数据版，其核心主题便是“推翻”东方文明长期引领世界的“假设”。

（一）“想象的敌人”与中美周边体系性对抗（1949—1972）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对美外交很大程度上陷入停滞，其根本原因在于，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至20世纪70年代初中美关系初步正常化期间，中美近乎处于全面对抗状态。源于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意识形态敌视，美国拒绝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双方军事、政治、经济及文化等交流全面中断，中国很大程度上被建构为美国“想象的敌人”。在周边地区，中美基于体系性对抗思维，形成恶性互动循环，双方主要围绕台湾问题、朝鲜战争、越南战争等展开了多次直接或间接较量。

这一时期，中美围绕台湾问题发生了两次危机，即1954—1955年第一次台海危机和1958年第二次台海危机，其中第一次危机更多是双边性的，而第二次则具有明显的体系性色彩。需要指出的是，这两次危机的另一个共同特征是，高度而持续的对抗性并未对双边关系的学习曲线产生重要影响，都是在危机升级至特定阶段后，中国出于内部考虑而推动危机缓解。这也对美国此后在两岸关系、中美关系方面的政策假设产生了长远影响。

如果说新中国的成立迅速引发美国国内舆论反弹，对华认知转向负面，那么1950年6月至1953年7月的朝鲜战争，便直接推动了美国对华“敌人”认知的固定。朝鲜战争既是二战后东亚地区的第一场战争，也是新中国成立后中美双方的第一次直接对抗。正因如此，在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不仅迅速为自身武装干涉朝鲜半岛事务制造合法性理由，更为其武力阻挠中国实现国家统一制造事端。就在朝鲜战争爆发后的第三天即1950年6月27日，杜鲁门总统命令第七舰队进入台湾海峡，以武力阻挠中国人民解放台湾。此后，美国又试图将战火烧向中国，正因为美国的步步进逼，导致了中国不得不进行抗美援朝。作为中美冷战后的第一次正面对抗，朝鲜战争不仅对中美关系产生了长远影响，对朝鲜半岛的长期和平与稳定也产生了难以估量的影响。

与越南战争相比，中美在朝鲜半岛和台湾地区的对抗都相对短暂。很大程度上，美国是从法国手中“继承”或“接管”了越南问题，并逐渐将其升级为一场持久战。对美国而言，“继承”越南问题的根本逻辑在于对“共产主义扩散”的恐惧。艾森豪威尔总统在1954年提出“多米诺骨牌效应”，某种程度上是对美国社会及西方世界的“恐吓”。他强调，由于中国的存在，一旦越南“沦陷”，西方在远东地区的防线就会像“多米诺骨牌”一样倒塌，直至全部

“沦陷”。^① 为避免这一“多米诺骨牌”现象，美国在近20年的时间里陷在越南战争的泥沼中难以自拔，不仅投下远超过二战时期总投弹量的炸药，动用除核武器以外的几乎所有新式武器，更使多位总统难以“体面”下台。正是这一日渐难以承受的成本，使美国在20世纪60年代末逐渐意识到，解决越南问题“关键不在河内，而在北京和莫斯科”。^② 也正是这一认识，推动尼克松总统上台后尝试实现与中国的关系正常化，其后果是中美从“想象的敌人”迈向“想象的朋友”。

（二）“想象的朋友”与对中国周边放任自由（1972—2008）

大致而言，中美“想象的朋友”关系仅持续了10年左右，即从1979年至1989年，但却存在重要的向前追溯和向后延伸期：向前可追溯至1972年尼克松访华，向后可延伸至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甚至直到2011年奥巴马政府启动“亚太再平衡”战略之后。中美“想象的朋友”认知不仅促进了双边关系发展，更拓展了周边中间国家的政策空间，使大量位居中美之间的中间国家可发挥更为明显的中等强国（middle power）作用——尽管这有时是消极的。

首先，在20世纪80年代，中美接近的直接战略后果，是中国与周边地区各国关系的全面改善。尽管地理距离较近，但中国与东南亚国家的外交关系不如想象中顺利：由冷战而来的意识形态竞争，使中国与马来西亚、泰国、菲律宾等国在20世纪70年代建立外交关系后就难有进展；中国与印度尼西亚关系长期相对困难，到1985年才逐渐恢复并在1990年后得到了进一步发展；直至1990年与新加坡、文莱建立外交关系，中国才实现与东盟所有成员国均建立外交关系。可以说，中国与东南亚国家关系的全面发展，很大程度上源于中国与美国关系的改善。

其次，冷战结束后，中美并未重返体系性对抗，基于“想象的朋友”认知的路径依赖，为周边中间国家提供了重要的中等强国作用发挥空间，其典型是澳大利亚和东盟。澳大利亚较早发现中美不再专注于体系性对抗所带来的政策空间，亚太经合组织就是在其倡议基础上得以创建的，并成为亚太地区一体化进程的重要倡导机制。相比之下，成立于1967年的东盟在冷战时期并未取得明显进展。但冷战结束的确是其成为东亚地区一体化“驾驶员”的重要推动力

^① 资中筠：《战后美国外交史——从杜鲁门到里根》，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第583页。

^② 尼克松：《尼克松回忆录》（上册），北京：商务印书馆，1978年，第348页。

量，其标志是东盟地区论坛和东盟与中日韩（10+3）两大机制的创立和发展：前者在20世纪末、21世纪初一度是东亚地区最为重要的安全对话机制，它将东盟对地区安全合作的关切传递给外部大国，进而形成了一种观念的向外辐射；而后者则推动东亚地区一体化达到一个高潮——其代表是东盟与中国、日本、韩国等的自贸区建设。

再次，中美对周边中间国家的放任自由，为后者塑造地区洛克式和平文化创造了重大有利条件。国际关系主流理论近乎一致地假定，由于东北亚地区充满文化多样性，地区各国政治制度差异大，历史纠纷多，各国力量对比变化快，必然导致既有的安全困境、声望竞争、领土争端、历史怨恨及经济冲突被放大，并导致整个地区陷入冲突。^① 尽管如此，冷战结束后的东北亚总体上保持了稳定甚至是和平，国家间的合作与协调非但没有削弱，反而有所强化，尤其是在朝鲜核问题上。同时，地区内错综复杂的历史敌对情绪，并未影响地区经济合作，尤其是中国的崛起很大程度并未被视作威胁，而是被当作了机遇。

最后，中美对周边中间国家的放任自由，很大程度上也为部分“麻烦制造者”提供了政策空间，特别是那些追求发展核武器的国家，大致包括朝鲜、伊朗、印度、巴基斯坦以及潜在的日本、韩国等。尽管有人将这归因于核技术门槛的降低，^② 但体系性大国对中间国家的约束力下降本身明显提供了体系性动力。

（三）体系性竞合与中美在中国周边“短兵相接”（2009—）

冷战结束后，面对体系转型特别是日渐明显的权势转移进程，中美双方均尝试重新界定双边关系，体系性竞合逐渐成为事实上的双边关系战略定位。克林顿政府一上台便尝试“接触+遏制”的“两面下注”（hedge）战略：一方面努力推动中国融入世界市场经济体系；另一方面制衡中国的“不配合”行为，为接触战略添加“保险”。随着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美国越来越倾向于认为，先前对“两面下注”战略中的接触强调过多且并不成功，因此是时候强调遏制的一面，由此催生了当前明显可见的地缘经济加地缘政治的复合竞争，

^① G. John Ikenberry and Michael Mastanduno,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and the Search for Regional Stability,” in G. John Ikenberry and Michael Mastanduno, eds.,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and the Asia-Pacific*,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3, p.2.

^② William Langewiesche, *The Atomic Bazaar: The Rise of the Nuclear Poor*, New York: Farrar, Straus and Giroux, 2007, p.88.

特别是导致了中美在周边地区的“短兵相接”状态。

首先，基于对华“接触”已然失败的假设，美国试图在周边地区与中国“全面竞争”，进而导致双方在地区内的互动，某种程度上更具对抗性。具体而言，中美在中国周边的“短兵相接”可能包括以下六个方面：台湾问题、中美经贸关系、海上安全、领土和海洋争端、防核扩散及国际体系转型。为避免对抗演化为危机，美国往往强调两个方面：一是如何突破因中国实力强大而来的反介入/区域拒止战略，或者说实现美国的介入；二是通过战略对话，减少战略模糊性并提升战略互信度，其核心目标是信心建立机制。

其次，自奥巴马政府启动“亚太再平衡”以来，美国加大了利用中国与周边国家的领土和海洋争端的力度。自2010年以来，东亚地区的领土和海洋争端呈现一种集中性爆发态势，但美国扮演的角色并不积极，^①而是利用其影响力煽风点火，明显是在支持其他国家与中国对抗。无论是奥巴马政府还是特朗普政府，都一方面声称在南海问题上保持中立，另一方面却无理纠缠，强调所谓航行自由、地区秩序、主权平等等。^②但事实上，美国所要的并非各国依据国际法所享有的真正的航行自由，而是美国军舰军机所专享的“横行自由”。^③事实表明，美国曾经所提出的“对南海仲裁案结果不持立场、不选边站队，支持直接当事方开展对话”不过是一句空话，美国对于维护与中国的战略互信根本不在意。此外，美国还继续在南海地区通过抵近侦察、军舰巡逻等手段，刺探中国军事情报，破坏地区稳定，动摇中美互信。尽管包括菲律宾政府在内的东南亚国家仍更多强调争端的和平解决和双边解决，但美国特别是特朗普政府仍不时尝试炒作该议题，特别是经常性派军舰进入南海地区。

最后，自蔡英文担任台湾地区领导人后，美国利用台湾问题制造摩擦的意愿和力度均明显强化。奥巴马政府在结束前，曾有一波利用台湾问题制造摩擦的运作，包括允许蔡英文赴美途中“过境”美国，通过含有美台高层军事交流内容的“2017财年国防授权法案”等。特朗普在当选候任期间就与蔡英文

^① 张春认为，“美国可称得上东亚地区领土领海争端集中爆发的罪魁祸首”。王鸿谅：《国际权势转移中的东亚格局》，《三联生活周刊》2012年第37期，<http://www.lifeweek.com.cn/2012/0918/38533.shtml>。

^② “Remarks by President Obama in Address to the People of Vietnam,” The White House Office of the Press Secretary, May 24, 2016, <https://www.whitehouse.gov/the-press-office/2016/05/24/remarks-president-obama-address-people-vietnam>。

^③ 《2016年5月24日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主持例行记者会》，中国外交部网站，2016年5月24日，http://www.fmprc.gov.cn/web/fyrbt_673021/jzhsl_673025/t1366070.shtml。

通电话，此后甚至表示“一个中国”原则是“可以谈判的”，并在2018年3月通过“台湾旅行法”。针对美国政府的种种冒险举动，中国政府不仅表示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还强烈敦促美国行政部门和国会恪守在台湾问题上向中方做出的承诺，遵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原则，停止美台军事联系和售台武器，以免给中美关系和台海和平稳定造成损害。

二、周边外交视角下的中国对美外交创新

中国与美国的互动，很大程度上代表着一个古老文明与一个新兴文明的对话。基于我悠久的历史文化传统，中国往往较为及时地依据时事变化而调整、丰富和创新对美外交的战略理念、战略内涵和战略手段。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对美外交经历从无到有、由简至繁的发展，其战略理念从一开始相对短期的体系对抗思维，逐渐发展为着眼于整个人类可持续发展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据此提出了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构建的战略目标；其战略内涵从最初的政治独立与生存，朝向经济繁荣与富足、文明交流与理解方向发展；其战略手段从相对简单的竞争或合作朝向竞合并存并塑造国际公共产品比较优势结构的方向发展。

（一）战略理念创新：建构中美新型大国关系

随着相互依赖的日益深入，中美两国成了无法分离，但又“相看生厌”的两个大国。但前提是明确的，即中美两国是事实上的利益共同体，更在全球层次上同属一个命运共同体。^①这一前提，恰好就是中美建构新型大国关系的基础。可以认为，当中美围绕命运共同体理念形成共识时，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建构就相对顺利；反之，中美关系就可能陷入困难。迄今为止，中美主要围绕全球气候变化治理、国际发展合作及国际安全治理等展开合作。对周边国家而言，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建构顺利，周边地区各国的政策空间就更大、更自由；反之则可能更小、更困难。

尽管2009年在哥本哈根气候变化大会上中美相互指责，但到2014年这一格局已经完全逆转。2014年11月12日，中美发表首份气候变化联合声明，强

^① 潘亚玲：《中美社会和人文对话机制：既有基础与战略路径》，《美国问题研究》2017年第2期，第82页。

调两国“在应对全球气候变化这一人类面临的重大威胁上具有重要作用。该挑战的严重性需要中美双方为了共同利益建设性地一起努力”。^①同日，中美两国宣布了各自2020年后应对气候变化行动。^②2015年9月，中美两国元首发表第二份气候变化联合声明，其最重要的意义是“致力于达成富有雄心的2015年协议，体现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和各自能力原则，考虑到不同国情”。中美双方进一步认为，应以恰当方式在协议相关要素中体现“有区别”。^③事实上，正是中美的相互合作，推动了2015年底气候变化《巴黎协定》的最终达成。2016年3月31日，中美两国元首再次发表气候变化联合声明。该声明再次宣示了中美合作决心，认为“中美气候变化方面的共同努力将成为两国合作伙伴关系的长久遗产”。^④应当承认，中美围绕全球气候变化治理展开合作，对整个中国周边有着重要的积极意义。

国际发展合作也是中美共同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的重要领域。2015年9月，在访问华盛顿期间，习近平主席与奥巴马总统围绕中美发展合作达成“受援国提出、受援国同意、受援国主导”的原则。根据该指导原则，中美于2015年9月签署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和美国国际开发署关于中美发展合作及建立交流沟通机制谅解备忘录》，建立了中美发展合作沟通机制与合作框架，明确了发展合作领域和内容，并决定共同积极支持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落实。2016年4月，中美举行了首次中美发展合作年度会议。就周边地区而言，中美双方都认识到自身对维护地区和平、稳定、繁荣的重要性和共同责任，决定协调推进区域经济一体化，同意加强在亚太经合组织、东亚峰会和东盟地区论坛等地区多边机制框架内的沟通与协调，并开展好同第三方的合作项目。^⑤

国际安全治理也是中美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方面，特别是在对中国周边地区而言高度重要的核安全方面。核安全合作也是中美元首高度共识的

① 《中美气候变化联合声明》，新华网，2014年11月12日，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14-11/12/c_1113221744.htm。

② 《中美气候变化联合声明》，新华网，2014年11月12日，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14-11/12/c_1113221744.htm。

③ 《中美元首气候变化联合声明》，中国外交部网站，2015年9月25日，<http://www.mfa.gov.cn/chn//gxh/zlb/smgg/t1300787.htm>。

④ 《中美元首气候变化联合声明》，新华网，2016年3月31日，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16-04/01/c_128854045.htm。

⑤ 《中美元首杭州会晤中方成果清单》，中国外交部网站，2016年9月4日，<https://www.fmprc.gov.cn/web/zyxw/t1394413.shtml>。

重要产物。习近平主席连续参加了2014年第三届和2016年第四届核安全峰会，对推动中美两国核安全合作，共同提高全球核安全水平和促进核不扩散做出了贡献。2016年，中美双方举行了核安全问题首次年度双边对话，并于第四届核安全峰会期间发表了《核安全合作联合声明》。

（二）战略内涵创新：政治—经济—人文三支柱并进

从周边外交视野看中美关系的发展史，可以得出一个基本规律，即中美关系整体是否良好，对周边地区有着重要影响。随着国际权势转移进程的推进，中美关系呈现诸多新特征、新可能，如美国政治文化转型与美国对华战略的互动，美国对华战略“脱钩”的再尝试，中美双边—多边的新型互动态势，等等。总体上，特别是自特朗普上任以来，中美关系“战略互动总体稳定，战术竞合风险飙升”的特征正变得日益明显。这对周边国家来说很大程度上是不利的，因此也凸显了中国对美外交另一创新的重要性，即不断夯实经贸合作的压舱石功能，同时加大中美人文交流力度，形成中美关系政治—经济—人文三大支柱并进的局面。

首先，尽管战术性竞争风险正在上升，但中国仍尽力确保中美战略互动的稳定性。尽管由权势转移进程加速而来的中美政治关系正趋于紧张，但中美的确建立了大量机制以确保双方关系的基本框架得以稳定。特朗普就任美国总统以来，尽管中美关系的不确定性明显上升，但战略层面的互动似乎仍总体稳定。其最为重要的特征便是习近平主席与特朗普总统的领导人友情往往并不因双方具体议题的争议而恶化，有时甚至反而是缓解战术层面交恶的重要保障，中美贸易摩擦的发展表现得最为明显。可以认为，正是双方战略互动的总体稳定，确保了中美在战术层面的种种竞争不会失控，这也进一步印证了中美关系进入体系性竞合阶段的判断。

其次，尽管中美贸易摩擦自2018年成为关注焦点，但中美地方经贸合作的深化的确有助于中美关系压舱石的进一步夯实。例如，2017年，在货物贸易方面，中国是美国5个州的最大出口市场，是美国46个州的前五大出口市场；而在服务贸易方面，中国是美国18个州的最大出口市场，在所有50个州都位居前五。不仅如此，对华贸易为美国创造了大量就业，仅2016年所创

造的就业机会就超过100万个，在29个州创造了1万个以上的就业机会。^① 同样，中国对美投资的快速增长，也为美国地方创造了大量就业，带动了经济发展。因此，2018年受贸易摩擦影响而出现的中国对美投资大幅下降，对美国地方社区而言无疑是相当消极的。正如美国企业研究所（American Enterprise Institute）强调的：1975—2015年间的数字表明，贸易赤字并不意味着美国就业流失；同时，数据同样表明，人民币汇率并未影响美国国内就业，事实上是1994年人民币贬值后美国国内就业反倒上升了，在1995—2015年，人民币汇率的变化很可能对美国就业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②

最后，人文交流正日渐成为中美关系的三大支柱之一，与政治互信、经贸合作相并行。人文交流长期以来都是中美战略关系的重要润滑剂，扮演着中美关系探路者、铺路者和护路者的角色。在经过前期的大量积累之后，中美人文交流在2010年进入新的发展阶段，即机制化、系统化发展时期，其标志是中美人文交流高层磋商机制的正式建立。特朗普上台后，对中美关系和中美人文交流的认知均趋于负面。尽管如此，中美人文交流仍总体保持平稳，不仅实现机制平稳过渡，还总体上维持了核心动力。2017年4月，习近平主席访问美国，期间同特朗普总统达成建立中美社会和人文对话机制的新共识。2017年9月，首轮中美社会和人文对话在华盛顿举行，并通过《首轮中美社会和人文对话行动计划》。在实现水平拓展的同时，中美地方人文交流也日益朝向纵深发展，其中最显著的是中美友好省州、城市、区郡关系的发展。从1979年到2018年底，中美已建立277对友好省州和友好城市。尽管特朗普总统上台后中美友好省州关系结对数量有明显下降，但2018年出现了回升迹象，说明在中美关系竞争面加大的背景下，中美人文交流的基本动力仍得到了有效维护。此外，中美地方人文交流还在教育、立法、经贸合作等领域取得了长足发展。

（三）战略手段创新：塑造国际公共产品供应比较优势^③

尽管由于美国政治文化转型而导致中美关系竞争面上升，但中国仍设法通过战略手段创新，推动中美关系新定位，特别是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建构。这

^① US-China Business Council, *State Export Report: Goods and Services Exports by US States to China over the Past Decade*, April 2018, p. 4.

^② Derek Scissors, "Fixing US-China Trade and Investment," Working Paper, AEI April 20, 2016, <http://www.aei.org/wp-content/uploads/2016/04/China-US.pdf>.

^③ 本节论述主要借鉴了张春：《国际公共产品的供应竞争及其出路——亚太地区二元格局与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建构》，《当代亚太》2014年第6期。

一战略手段创新便是迄今仍少有学术关注的中美国际公共产品供应的比较优势结构塑造，实现中美在国际公共产品供应的领域性配合而非地域性竞争。

经过改革开放40余年的发展，中国经济实力大幅提升，为国际社会提供国际公共产品特别是经济类公共产品的能力大大增强。形成这一发展的根本在于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实力的持续增长。中国供应地区乃至全球经济类国际公共产品的重要努力，始于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通过不让人民币贬值为亚洲国家稳定金融、经济形势提供了重要帮助。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中国供应地区和全球性经济类公共产品的能力和意愿再次凸显，特别是在稳定周边国家经济形势和引领后者走出经济困境方面。自2013年习近平主席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后，中国在地区和全球性经济类公共产品供应方面有了新的抓手，并发起或参与建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亚投行）、丝路基金、金砖国家新发展银行等机制。

需要指出的是，尽管中国所供应的经济类国际公共产品总体很受欢迎，但美国所供应的安全类公共产品总体上被认为是亚太地区稳定的最重要保障。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最为核心的原因仍是中美在地区安全中的角色差异：中国与这些安全问题的关联更为紧张甚至有着重要的直接利益关系，而美国更多发挥“离岸平衡手”作用。首先，尽管周边地区仍存在大量的领土和海洋争端，但最为突出的仍是中国与周边国家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争端；其次，尽管全球层次的冷战早已结束，但在中国周边地区，冷战思维仍显而易见；再次，地区各国的历史性冲突和记忆，对地区安全的未来影响极可能是消极的；最后，中国周边地区汇聚了多个崛起/复兴大国，成为国际权势转移的策源地，中国自然成为整个国际权势转移的矛头所指。因此，就中国周边地区而言，几乎所有结构性指标都指向一种不稳定预期。^①这样，基于美国在中国周边地区所发挥的历史性作用，相对而言的距离感，以及其强大的军事能力，美国总体上被认为能够为地区安全带来更多稳定因素——尽管事实可能并非如此。

由此可以认为，在中国周边地区，公共产品的供应存在一种比较优势结构：中国在经济类公共产品的供应上更具优势，而美国的优势则是在政治、安全等公共产品供应上。这一比较优势结构对周边地区而言无疑是有利的，因这可为其提供利益最大化的机会。但如果中美难以就此难达成共识，特别是在美国

^① Richard Betts, "Wealth, Power, and Instability: East Asia and the United States after the Cold Wa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18, No. 3, Winter 1993/4, p. 34.

试图扭曲中国在地区公共产品供应中的角色的话，那么周边地区可能不仅无法从中得益，反而会受损严重。

三、中国对美外交转型的周边逻辑

在2018年6月举行的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当前是中国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期，是国际体系转型过渡期。这一两期叠加态势，对中国对美外交提出了新的要求。由于对美外交长期是中国对外工作的重要方面，因此其所涉及的因素相当复杂。从周边外交的视角看，中国对美外交的未来发展需要关注三个方面的重要发展，分别对应美国、周边和中国。

（一）美国的战略冒险主义

冷战结束后，美国一直试图寻找新的“敌人”或“对手”，进而延续自身霸权地位。但冷战结束后的另一客观事实是，权势转移并不只是发生在国家之间或传统的国际体系层次上，还发生在国家与非国家行为之间或全球体系层次上。^① 尽管如此，美国却出于战略制定的便利和对历史经验的简单化解读，将其简化为从美国到中国的权势转移；出于同样的逻辑，尽管中国崛起或中美权势转移本身也充满各种复杂性，但美国却采取了冒险主义的外交战略“预防性管理”中美权势转移^②，而特朗普总统种种“反外交”行为更令局势更加复杂。

美国“预防性管理”中美权势转移的最冒险举动，核心是在中国周边地区从传统均势的“离岸平衡手”朝向“均势操盘手”发展。自二战结束后直至21世纪初的东北亚地区均势结构，事实包括两个层次：由美国和苏联/俄罗斯组成的离岸平衡手，和由中朝、日韩组成的均势操盘手。这一格局在冷战时期的对抗中最为直接地体现在朝鲜战争中。尽管战争相当激烈且美国直接介入均势，但正是由于美国的直接介入，苏联只能作壁上观。更为重要的是，在朝鲜战争结束后，东北亚地区的均势结构更加明确，即中朝与日韩成为直接的均势操盘手，而苏联和美国则是对立的离岸平衡手。朝鲜战争结束后，东北亚两

^① [美]约瑟夫·奈：《权力大未来》，王吉美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2年，第157—158页。

^② 有关这一点，可参见张春：《管理中美权势转移：历史经验与创新思路》，《世界经济与政治》2013年第7期，第74—90页。

极格局的冷战局面最终形成，东北亚均势结构得以形成。受整个冷战时期美苏全球均势结构的影响，东北亚地区的均势结构也由中、朝、日、韩四国具体操作，转换为美国和苏联分别充当阵营两边的离岸平衡手。冷战结束使全球体系层次的美苏均势格局瓦解，但却没有根本上影响东北亚地区的均势格局。随着美国冒险性地聚焦于中美权势转移管理，美国正危险地从其传统的“离岸平衡手”“堕落”为“均势操盘手”。

从均势的发展史角度看，当英国逐渐卷入欧洲大陆的均势运转而成为直接的“均势操盘手”之后，它也就丧失了“离岸平衡手”的地位，并随之逐渐丧失了国际体系霸主的地位；取代英国短暂地成为欧洲均势的“离岸平衡手”的俄罗斯，也迅速地卷入均势运转而未能有效利用这一地位使自身成为体系霸主。^①成功从俄罗斯手中接过离岸平衡手角色的美国，则长期保持了这一角色，并以此赢得了体系霸主地位。换句话说，美国从“离岸平衡手”转变为“均势操盘手”，极可能加剧其因权势转移而来的霸权衰落进程，而这又会进一步刺激其战略冒险主义——而这正是美国在均势体系中角色转变的根源；由此，一个恶性循环似乎难以避免。

在美国对华战略冒险主义陷入死循环的同时，特朗普的“反外交”立场令形势更加复杂。其一，信奉“美国优先”论，特朗普总统上任后采取各种努力退出全球治理，如在2017年1月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6月退出《巴黎协定》，10月退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等等。其二，基于其个人经历，特朗普采取一系列的“反外交”手段，特别是创新性地运用所谓“推特外交”（twitter diplomacy），为国际社会带来严峻的外交沟通困难。对传统外交而言，“推特外交”的使用至少有三重冲击：传统外交舆论塑造方法，传统外交谈判的双层博弈逻辑，及特殊利益群体对传统外交的影响方式，都可能因此而发生重大改变。其三，特朗普总统对外交人员、外交礼仪等不屑一顾，更是对传统外交的重大冲击。

（二）周边的战略机会主义

随着美国刻意放大中美关系的竞争面，中国周边中间国家再次发现了其中蕴含的机会，尽管与中美“想象的朋友”时期的机会可能完全不同，表现为一

^① 有关国际均势体系这一“滚雪球”性的演变历史，可参见Ludwig Delio, *The Precarious Balance: Four Centuries of the European Power Struggle*,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1962。

种战略机会主义逐渐主导着周边国家对中美的战略抉择，从而推动一种“经济上靠中国、安全上靠美国”的战略格局日渐浮现。

一方面，尽管美国试图以各种手段，包括奥巴马政府时期的跨太平洋经济伙伴关系（TPP）和特朗普政府的贸易战，挤压中国在周边的经济影响力，但周边中间国家并未因此而全面追随美国，相反还积极利用中国提供的经济机会，特别是积极参与共建“一带一路”等。以周边各国参与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为例，在亚投行建设过程中，美国出于战略东移考虑，曾发挥过不好的影响，但绝大多数周边中间国家并未受美国影响，而是积极参与到亚投行的筹建之中，甚至包括在诸多问题上与美国走得极近的菲律宾也在2015年12月31日最后一刻宣布加入亚投行；随着中日关系在2018年逐渐缓和，日本对“一带一路”的态度也明显积极起来，中日双方对在第三方市场合作的意愿很大程度上是“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进展。另一方面，如前所述，尽管在经济上搭车中国，但周边各国仍选择在政治上、安全上依赖美国。

需要指出的是，周边中间国家也并非完全是在中国—经济、美国—政治安全之间选择，现实更为复杂，至少可识别出三类国家：一是俄罗斯和印度。随着美国战略东移从最初的“友华”转变为“防华、反华”，处于中美之间的地区大国特别是俄罗斯和印度获得了更大的战略筹码，使自身在面对中美时拥有更大的话语权，其政策空间明显增大，能更为积极地对亚太地区事务发挥影响力，对中国周边事务参与活跃度明显提升。

二是美国的盟友和准盟友。尽管其政策空间扩大但战略选择却呈两极分化态势：或在对华战略上保持与美国的步调一致，共同营建对华的战略包围圈或防火墙；或试图在中美之间搞平衡。

三是其余周边中间国家。由于其政策空间遭受较大挤压，因此大多处于一种战略选择的两难困境之中，多选择一种骑墙或观望的态度。所有这些国家的战略机会主义都相当明显，其中蒙古、朝鲜或许更加明显。蒙古事实上选择一种在中美之间“左右逢源”的战略。早在2012年，蒙古就参加了北约峰会，并提出“第三邻国”政策，推动同美国、日本等国关系的发展；2014年，中俄蒙三方合作机制启动，并在2015年批准了《中俄蒙发展三方合作中期路线图》，着力打造中俄蒙经济走廊。换句话说，中美关系竞争面的上升，客观上提高了蒙古的地缘政治地位，为蒙古释放了战略空间。朝鲜的战略选择也较为明确。朝鲜曾充分利用克林顿和小布什政府对朝政策的“失败”，奥巴马政府的“战略忍耐”的确使朝鲜一度成为“被人遗忘的地方”，但特朗普在与朝鲜

的多次“边缘战略”未果后转而采取接触战略，朝美两国领导人迄今的两次会晤大大改善朝鲜的生存环境，并带动了整个地区局势的变化——尽管其中长期战略后果迄今仍难以判断。

（三）中国崛起的战略可持续性

当前阶段是中国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期，中国必须结合自身崛起的时代性和特殊性，创新大国崛起之路，提高中国崛起的长期可持续性。具体而言，这一崛起道路的创新大致可包括三个方面。

第一，中国崛起战略步骤的世界历史性创新，即采取新型的“四步走”战略。大国崛起的传统模式可总结为三个要素，即同质性崛起——同一文明体系内的崛起；宽松性崛起——崛起国面临的战略挤压并不严重；武力性崛起——主要通过军事征服或霸权战争实现崛起。但中国当前的崛起环境、时代背景已经完全不同，中国并非当前主导国际体系的力量同质文明，军事崛起今天既不可能、也不符合中国文化传统，中国崛起也早已被用放大镜观察。因此，中国崛起的战略步骤必然不同于历史上的既有模式。基于大国崛起的历史经验和中国崛起的特殊性和时代性，中国实现体系内全面崛起的战略目标应当采取一种“四步走”战略，即经济性崛起先行，道德性崛起紧随，制度性和军事性崛起押后。当然，这“四步走”并非固定不变，而应结合历史经验与现实发展，及时调整，确保总体战略节奏与局部战术步骤之间的合理平衡。

第二，中国崛起战略溢出的世界历史性创新，即让发展中国家特别是周边国家成为中国崛起的受益者。由于传统大国崛起多通过军事性或武力性崛起实现，因此，其战略溢出总体上是消极的。特别是对广大发展中国家而言，传统大国崛起更多是“小国的悲剧”而非“大国的悲剧”。因此，中国当前崛起的第二大创新便是其积极溢出，特别是使发展中国家特别是周边国家成为中国崛起的“受益者”，不再如同历史上那样是“受害者”。尽管实现这一创新并不容易，特别是世界历史上大国崛起尚无此类先例，但中国外交已有一定经验和尝试：一方面，自新中国成立之初起，中国便尝试为发展中国家提供各类公共产品，在国际舞台上始终站在发展中国家一边，做发展中国家的可靠朋友和真诚伙伴；另一方面，中国目前正尝试建立与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共享机制，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和新型国际关系建构，其核心抓手便是推进“一带一路”倡议的落实，与国际社会合作大力促进联合国2030年议程的落实，等等。

第三，中国崛起战略落实的世界历史性创新，首先要求创新持续崛起的

能力建设，特别是允许地方政府、民间力量等承担更多中国崛起的战略任务。传统上，地方政府参与对外交往存在重大限制。但随着全球化和相互依赖的深入，地方政府在国家对外工作中的政策空间正快速上升，并可发挥重要的“补位外交”作用。在地方参与国际交往特别是中美经贸合作的过程中，一方面可根据自身利益关切开展先行试验，另一方面可在特定领域补充国家总体外交。^①

四、周边视角下的中国对美外交展望

源于中美两大文明的不同文化特性及中美两国的不同发展历程，中美两大文明的互动更多发生在中国周边地区而非美国周边地区。因此，透过周边视野观察中美关系的发展，可为中美关系的未来方略提供诸多参考。从中国长期可持续崛起的角度看，周边地区在中国对美外交的未来设计中有着重要地位，其核心是使周边地区成为中美之间的桥梁，而非麻烦，具体体现为四个方面。

首先，要使周边地区成为中美公共产品供应比较优势的确认者。

如前所述，就周边地区的国际公共产品供应而言，中美的比较优势结构已经事实上存在；而就中美供应地区公共产品的实践而言，周边地区已用其实际行动或选择进一步强化了这一比较优势结构，即所谓“经济上靠中国、安全上靠美国”的二元格局。但一个根本问题在于，周边国家仍是自发地巩固这一比较优势结构，尚未上升到自觉的高度。为有效管理周边国家的战略机会主义，就必须使周边国家在中美公共产品供应的比较优势结构建构中的角色，从消极变为积极，从自发变为自觉，使其有意识地确认中美公共产品供应的比较优势。由此需要采取的战略举措大致包括：一是进一步巩固中美在地区公共产品供应方面的比较优势，特别是要进一步提升中国自身的经济公共产品供应能力；二是设计安全、政治乃至思想类公共产品供应的合理战略节奏，避免给予美国和周边地区过于“强势”的错误印象；三是设计全面、完整和有效的宣传战略，使周边地区基于公共产品供应比较优势结构的中美分工，将确保地区各国获益最大化，从而使其乐意确认、维护甚至优化中美分工，不再从机会主义视角在特定议题上选边站。

其次，要使周边地区成为中美价值链重构的中间人。

^① 张春：《地方参与中非合作研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22页。

特朗普政府对华发起贸易战的核心目标并非其所宣称的贸易公平，而是阻遏中国的长期可持续崛起。尽管如此，中美经贸关系的转型，中美价值链与产业链的重构，仍将是未来一段时间影响中美关系及中美在周边地区互动的重要方面。虽然周边地区貌似并非中美贸易摩擦的一部分，但中美经贸关系转型和价值链、产业链重构，对周边国家来说意味着重大的经济机会。需要指出的是，由于中国自身完整的经济体系、庞大的经济规模和巨量的市场潜力，中美经贸关系不可能“脱钩”，中美价值链、产业链的重构很大程度上并非简单的转移，极可能是价值链与产业链的拉伸与拓展。这意味着，中美经贸关系、价值链、产业链将从先前相对简单的“两点一线”演变为更为复杂的、充斥着各种中间节点的网络体系。在这一网络体系中，周边国家由于其地理位置、劳动成本、经济结构等原因，有成为升级后的中美价值链的中间环节的重要潜力。中国应充分利用中美贸易摩擦带来的转型、调整压力，以共建“一带一路”为主渠道，有意识地推动和培育周边地区的桥梁作用，积极、稳妥并系统地重构中美价值链。

再次，要使周边地区成为中美全球治理合作的示范区。

尽管特朗普政府在全球治理领域有大量的“退出努力”，并不意味着中美全球治理合作的“死亡”。恰好相反，中美全球治理合作当前的低潮极可能酝酿着下一个高潮或反弹。在这一时期，中国应从中美全球治理合作的示范区打造的角度思考周边外交。这既可促进中国与周边地区的全球治理合作，更可为中美全球治理合作的新高潮作准备。中国可与周边各国率先启动合作，并在恰当的时机将美国纳入其中，从而既能建立某种领先优势，又能通过三方合作及多方合作促进中美全球治理合作。具体的合作领域最为主要的包括：一是全球气候变化治理合作，其重点是周边地区的小岛国、内陆国等，重点领域可以是地方性气候变化合作，碳交易市场建设等；二是国际发展合作，其重点是联合国2030年议程的减贫目标；三是地区安全合作，特别是冲突国家的冲突后重建、可持续转型，地区核安全治理，等等。

最后，要使周边地区成为中美文明互鉴的试验田。

中美文明互动的历史并不长，但已经产生了大量或积极或消极的因素。为促进中美关系的持续健康稳定发展，应当高度关注周边国家的如下客观事实：一方面，周边国家的华人华侨数量众多，并曾为中国的改革开放与国家发展做出重要贡献；另一方面，周边国家深受美国影响，文化上与美国的联系也相当密切。由此而来，周边国家很大程度上是中美文明互鉴的前沿阵地，尽管中

国、美国及周边国家都很大程度上认识不够充分。就此而言，中美人文交流应当大力拓展视野，不仅要直接从双边层次上促进中美人文交流，更要从三边、多边的层次促进中美文明互鉴。周边国家的华人华侨与美国人的具体接触，对美国文化的切身感受，及对周边各国当地人民对中美文明的个体理解，都将是中美文明互鉴的重要源泉，也将成为中美关系未来发展的敏感触角。

China's Diplomacy toward the U.S. in the Past 70 Years: A Review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hina's Diplomacy with Its Neighboring Countries

PAN Yaling

Abstract In history and reality, the interactions between China and the U.S., the two major civilizations of the world, mostly took place in China's neighboring countries and regions. Viewe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hina's diplomacy with its neighboring countries, the China-U.S. bilateral relations roughly got through three stages: from the systemic confrontations in strategic hostilities, through the "laissez-faire" period derived from their strategic integrations, to the direct games against the background of strategic rivalry. During all this process, continuous innovations have been realized in China's diplomacy toward the U.S., creating a far-reaching influence on China's neighboring countries. The strategic idea guiding this diplomacy has been upgraded to the concept of a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for the purpose of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all humans. The contents of this diplomacy are supported by three columns: politics, economy, and humanity, and is being expanded forward continuously. Whereas the key strategic means of this diplomacy have been transformed to shape a structure that may have the comparative advantages to provide international public goods. Despite of all these changes, U.S. strategic adventurism toward China is on a rise, and the strategic opportunism of China's neighboring countries also becomes more prevalent. In this sense, China has to meet even higher demands if it wants to achieve a sustainable rise. The core of these demands is to guarantee that China's neighboring countries act as bridges, not troubles between China and the U.S. particularly, China's neighboring countries should become confirmers of the China-U.S. structure of comparative advantages for providing public goods, and middlemen of the reconstruction of the China-U.S. value

chains. They should act as the demonstration areas of the China-U.S. cooperation for global governance and experimental fields of the mutual learning between China and U.S. civilizations.

Key Words Neighboring Diplomacy; China-U.S. Relations; Rise of China; A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Author Pan Yaling, Associate Professor at Center for Indian Studies of Yunnan University, Adjunct Researcher at Center for American Studies (CAS) at Fudan University.